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 近代报刊文选译

● 张金涛 ●



巴蜀书社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 近代报刊文选译

张 金 涛

巴蜀书社 中国·成都

责任编辑：何 锐

封面设计：李文金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近代报刊文选译

张金涛 译注

---

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福利东方彩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25 字数 160 千

1997 年 6 月第一版 199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ISBN7—80523—816—2/I·332

总定价：460.00 元（共三十九册）

## 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

主 编：戴 逸

副主编：杨东梁 段文桂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汝丰 王俊义 牛仰山 冯 杰

孙 静 李 侃 杨天石 杨东梁

杨宗义 张我德 胡绳武 郭毅生

段文桂 段志洪 龚书铎 程 歆

戴 逸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助编）

## 序 言

戴 逸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常称作“近代”。祖国的这段历史既坎坷、崎岖，又光辉悲壮。说它坎坷、崎岖，因为自从外国资本主义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中国不断受侵略，被欺凌，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国家濒于豆剖瓜分的灭亡危机，中国社会贫穷、落后、黑暗、腐败，人民群众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一段伤心、屈辱的历史。说它光辉、悲壮，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人民逐渐觉醒，起而抗争，投身战斗，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爱国主义精神高度发扬，许多志士仁人为祖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贡献了自己的生命，在近代历史上谱写了一曲又一曲英勇慷慨、气壮山河的乐章。

八十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很短暂的一段，但中国近代的八十年却丰富、曲折得多。它的蕴涵，它的光采，它的意义，比得过任何历史时代，比得过国破家亡的乱世凄凉，也比得过威烈壮

丽的盛世辉煌。

文学是时代的心声，时代决定了文学的内容、形式和意义。中国近代文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爱国主义的昂扬，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正气磅礴，充塞表里。你在阅读这套丛书时，必能感受到作者的忧患之感，经世之志，愤排之情。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支撑过艰难岁月，迎来了新生。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已得不到一百年前那种国步日艰、风雨如磐的切身感受。但读读这些文章诗词也可以体会到我们先辈面对的巨大灾难，体会到他们的思想感情与希望追求。一部中国近代史可以描绘出八十年中国的大概历程，而阅读这些名人名家撰写的名著名篇还可以带你进入那个刚刚逝去的时代，聆听他们的心声，体察他们的喜怒哀乐与所思所求，更深刻地认知我们国家和民族走过的这段路程。

诚然，由于本套丛书所选文章作者们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个人性格、艺术修养不尽相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深深地打上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比如像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等所谓“中兴名臣”，就是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步入他们事业颠峰期的。而在抵御外来侵略中，除左宗棠、彭玉麟等少数人尚能“锋颖凜凜”向敌外，往往奉行“曲全邻好”的妥协政策。译注者们在选文时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着眼于挖掘他们诗文中的积极因素，对其负面影响相信读者会自己去鉴别的。

近代的文章当然是从古代文章演变来的，但其体裁之多样，风格之变异，描摹之宽广，情感之激越，已非古代文章所能比拟。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奔腾澎湃；中西文化，冲突交

融，百川汇海，恣肆汪洋，变化万状，蔚为大观；传统的价值观、历史观、审美观都在嬗变；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承前启后的时代，必定勇于创新，富于创新。从当时的文章诗词中显示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闪光。我们既看到了对蕴蓄丰厚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又看到了对现代文化新领域、新路径的开辟。名家辈出，百舸争流，风格各异，精彩纷呈。龚自珍的瑰丽、魏源的务实、章太炎的古奥、林则徐的赤忱、孙中山的宏伟、康有为的鸷远、梁启超的清隽、谭嗣同的犀利、秋瑾的激昂、严复的卓远以及曾国藩的通博、左宗棠的雄浑、胡林翼的笃沉。八十年短短的历史画廊中挤立着如许众多的人物，我们聆听其心声，目窥其手裁，品评其论说。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至于这套丛书中的实业文、法制文、报刊文、外交使节文、海军海防文都已超轶了中国古代文体的范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新事物，而游记、笔记、序跋、日记之类的古老文体，也注入了新内容，充满了爱国忧时、经世致用的光彩。我相信，近代文史名著是可以传之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继承的取之无尽的宝藏。

编译《近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我们希望能比较全面地展示一百多年前的文史优秀成果。由于作品众多，内容丰富，体裁多样，选文难度较大。我们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选编，既从著名人物入手，如选编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诗文，孙中山的文章；或者几人合编一册，如严复、林纾合编，黄兴、宋教仁、朱执信合编，龚自珍、魏源合编，黄遵宪、邱逢甲合编；也有以人物群体合编，如戊戌六君子、辛亥烈士、晚清词人等；又有以事件为中心，把反映近代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诗文汇集在一起，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中日战争等等；还有以文章的体裁、流派、

类别汇编成册，如笔记文、游记文、序跋文、报刊文、桐城文等等。我们的想法是尽量搜集近代八十年优秀的代表作，反映这个时代文学的丰富多样。但这样选录，内容较为庞杂，各种文章不免发生交错，因此我们基本上按照作者的年代、写作时间排列，力求避免重复选录。

编译过程中，我感到欣慰的是组织了一个团结和睦，认真负责，又具有权威性的编委会。这个编委会集中了十几位在京的著名文史专家，同时还包括巴蜀书社四位经验丰富的高级编审人员，可谓是群贤毕聚，人才荟萃。编委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责任心强，工作十分努力，对编辑这套丛书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我们在选题确定后，约请了京内外数十位研究有素的作者编选、注释，并译成白话，译注者们兢兢业业，数易其稿，付出了艰辛劳动。

每部初稿完成后都要经过几位编委认真审读再经全体讨论，确定采录与否，并提出修改意见，真是一典之原，反复查核，一名之立，旬日踟蹰，个中甘苦，唯亲历者知之。然后又经过巴蜀书社编辑先生们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才奉献于读者面前。编选和翻译古籍是一项艰难繁重的工作，这部丛书必定还会有缺点和错误，但我与编委们共同工作了一段时间；为他们认真负责的精神所感动，也从他们那里学习到了许多新知识。

## 前 言

人类自有社会以来，就有了传递信息的需要。以报刊作为一种公开的大众信息传播媒介，则出现得比较晚。我国最早的报纸当属唐代的邸报，唐人孙樵所写《读开元杂报》记载的“开元杂报”应是现今已知最早的一种邸报。邸报主要传播官方消息，属官办性质，受到严格控制，在宋代还曾实行过官报检查制度——“定本”制度，故邸报只能发挥其行政政治作用，在社会文化方面则没有影响。北宋末年出现民营的“小报”，内容除抄录邸报之外，也登载一些官吏任免及朝野动向，具有了新闻的性质。由于封建王朝的查禁，小报只能秘密发行，始终未能发达。直到16世纪中叶以后，明代统治者才允许民间自设报局，翻印邸报，公开发售，称之为“京报”。京报在功能上已具有某些近代报刊的特点，但仍属古代报刊的范畴。近代报刊在我国的出现，还是鸦片战争前后的事情。

我国近代报刊的发展，是受外国人在中国办报活动直接影响的结果。我国最早的近代报刊均是外国人创办的。

19 世纪初，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也被带入中国，陆续出现许多外国人办的中文报刊。由于中国政府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办报，这类报刊最初由外国传教士在南洋出版，然后再散发到内地。这类报刊主要宣传宗教教义，也介绍一些科学知识和世界各国情况。其中 1815 年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为最早。

由于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国门，1840 年以后，外国人作为征服者，连同他们的报刊一齐涌入中国。原有的教会报刊继续发展，商业报刊也发展迅速，并逐渐取代了教会报刊。在中国各通商口岸，都有外国人办的报刊，先后大约出版有 300 家。70 年代，外国人开始创办中文日报，影响进一步扩大。如在旧中国具有广泛影响的《申报》、《新闻报》就是在这时创刊的。外国通讯社和报社也开始派驻华记者，设立驻华机构。外报作为在中国刊行的最早的近代报刊，在中国报业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中国人从外报上了解世界各国情况，也从外报的工作实践中认识到报刊的功能，学到办报的知识和技能，使一批参加外报工作的中国人受到职业训练，为自己办报创造了条件。当中国人自办报刊出现并很快形成高潮之后，外报的作用和影响就退居次要地位了。

我国的官报与外报并存长达百余年，直到民报出现，才有国人自办的近代报刊。1873 年在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是国内出版的最早的民报。较有影响的是次年由王韬创办于香港的《循环日报》。惜当时国人尚不了解报刊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未被国人所见重。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国人反帝情绪高涨，

康有为组建的强学会先后在京沪两地出版《中外纪闻》与《强学报》，执笔撰稿者皆主张变法维新的知名人士，所写政论使国人耳目一新，才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此后又有《时务报》、《湘报》等一大批维新派报刊相继问世，中国近代报业始勃然兴起。

## 二

中国近代报业的兴起，是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联系在一起的。鸦片战争以后，希望变革现实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新思想，开始仿效外国人的作法。由于从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中认识到报刊的各种社会作用，因而开始自己动手办报。像《昭文新报》、《循环日报》均是这样办起来的。王韬的《循环日报》是最早宣传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报纸，他主张向西方学习，鼓吹变法自强，这些思想被以后的维新派政治家所承袭。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维新变法运动，这些有识之士认为中国社会百弊丛生的原因之一是消息闭塞，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开设报馆，于是办报被作为变法维新的重要手段提了出来，各地维新派纷纷创办报刊，一时办报形成热潮。

1895年8月17日，维新派办的第一家报纸《万国公报》在北京创刊，由于与广学会办的报纸重名，不久后改名为《中外纪闻》。随后维新派团体强学会成立，并在上海出版《强学报》。由于封建顽固势力的严厉镇压，强学会和两报很快即被查禁，但是他们培养和锻炼了宣传骨干，积累了办报经验，为维新派后来报

刊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我国政党办报的先声。

1896年秋，维新派重新聚集起力量，由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等人首先在上海再办《时务报》，大力宣传变法维新，受到具有维新思想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欢迎。《时务报》因梁启超主编而风行全国，曾创当时报刊发行的最高记录，成为影响最大的维新派报刊。《时务报》的成功，使各地维新派志士大受鼓舞，纷纷办报。到戊戌政变发生前，维新党人和支持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所办的报刊就达70余种，是此前国人所办报刊的两倍多，形成近代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其中较重要的是澳门《新知报》、长沙《湘学报》和《湘报》、天津《国闻报》。

《新知报》是在康有为亲自领导下于1897年2月创刊，是维新派在华南的重要舆论阵地，与《时务报》形成南北呼应的态势。由于在澳门出版，清政府无法直接干预，刊登的言论比较大胆，敢言《时务报》所不敢言者。《湘学报》于同年4月在长沙问世，唐才常任主编，湖南许多著名维新派人士为该刊撰稿。第二年3月，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在湖南成立南学会，开办时务学堂，出版《湘报》，进一步推动了湖南的维新运动。这两份报刊成为维新派在华中的重要舆论阵地。《国闻报》于1897年10月由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津创办，是维新派的北方舆论阵地。《国闻报》也是维新派的第一家日报。

这次办报高潮的特点是，地区广泛，由沿海城市向内地发展，一些中小城市也出现了国人所办的报刊；报刊品种多样，读者覆盖各个层次；报刊与学会、学堂相结合，办报人员多为当地变法维新运动的领导人，形成了一支变法维新的宣传队伍。由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既是维新派领袖，又是著名学者，他

们亲自参与办报，以及报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而大大提高了报业、报人的社会地位。从此政治家办报成为我国报业的重要特点。

这次大规模的办报活动，冲破了封建统治者一贯实行的对民众言论的禁锢，使报刊成为广泛传播启蒙思想，进行救亡图存宣传教育的锐利武器，推动了变法运动，促成了变法的实现。

中国人办报的第一次高潮，伴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而兴起，也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而告终。维新派报刊绝大多数在戊戌政变后被冠以种种罪名而遭查封或被迫停刊。虽然维新派的办报活动并未中断，但宣传中心不得不转移到国外，国人的第一次办报热潮归于沉寂。然而低潮不会持久，这一时期为报业重新发展积累了有益经验，培植了适宜生长的土壤，造就和锻炼了人才，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 三

戊戌维新的失败使资产阶级维新派发生了变化，许多人开始猛醒，投身革命。一年以后兴起在中华大地上的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及其以后签订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则使更多中国人认识到救国必须革命的道理，走上了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道路。在这之后，中国报业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

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清王朝风雨飘摇，皇权即将崩溃，其统治力量日渐衰弱，各种政治派别都在抓紧时机，积聚力量，报业也随着政治运动的发展而日趋兴旺，出现了比维新运动时期

更为广泛的思想启蒙热潮。

尽管当时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态度不同，但都认为中国必须革新政治，进行社会变革。他们对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的口号，都采取热烈欢迎的态度。因此，报刊的宗旨大都以宣传爱国、号召救亡为中心，抨击清政府丧权辱国、昏庸腐败，认为只有努力学习西方、奋起自救，才能外御列强，内倡民权，挽救中国的危亡。

在日本，有保皇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猛烈抨击慈禧的黑暗朝政，继续宣传保皇立宪的改良思想；也有中国旅日留学生和流亡者出版的《开智录》、《译书汇编》、《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等，高扬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旗帜，对封建专制政治进行激烈批判。他们或要求人权、崇尚自由，或重视科学教育、反对封建礼教，或提倡男女平等、主张妇女解放，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兴中会，由于最初把主要力量都放在武装起义上，直到1900年1月才在香港创办第一份机关刊物《中国日报》。同时在国内秘密印发宣传小册子，其中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在上海和杭州等地相继有《大陆》、《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革命报刊问世。为了通俗宣传革命主张，还出现了《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以及宣传妇女解放的《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等。上海一家原来偏于保守的《苏报》，此时也转而宣传革命，并因发表介绍邹容《革命军》的文章及章太炎为该书所写的序言，而遭反动势力镇压，造成了震动一时的“苏报案”。

最著名的革命派报刊是1905年11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民报》，它是同盟会的机关报，由陈天华、朱执信、胡汉民、章太炎等人先后任主编。孙中山为《民报》撰写发刊辞，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此后《民报》始终以三民主义为主要宣传内容，并于1906年领导了对改良派的报刊大论战。《民报》与改良派的主要喉舌《新民丛报》是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双方的20多种报刊全部投入论战。论战的主要问题是走革命的道路还是走改良的道路，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实行君主立宪制，以及要不要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国有等等。这场论战最后以《新民丛报》于1907年7月被迫停刊宣告了保皇派的失败，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在论战的影响下，革命报刊发展很快，由论战前刊物不到30家、报纸仅10多家，增至40多家刊物和60多种报纸，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热潮，预感到灭亡的反动封建势力企图垂死挣扎。他们一方面疯狂镇压各地的武装起义，一方面更加严厉的查禁革命书刊。1906年7月，清政府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同年又由巡警部拟订《报章应守规则》，次年12月再颁发《大清报律》，报业受到严格控制与摧残。但是革命大势已不可阻挡，在武昌起义燃起的燎原烈火中，腐朽的清政府及其对报业的禁锢一起覆灭了。

辛亥革命的胜利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报界也解除了文禁，得到自由发展，出现了继戊戌维新之后的又一次办报高潮。在武昌起义后的半年里，全国报纸猛增至近500家，总销售量达4200万份，这两个数字都创历史最高记录。这段时间被称为报

界的黄金时代。

然而随着袁世凯的上台和“二次革命”的失败，辛亥革命取得的成果彻底丧失，历史进入袁世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时期，报界又一次遭受严密控制和疯狂镇压。国民党及其有关的报刊几乎全被查封，各地封闭报馆、迫害报人的事件时有发生。袁世凯还制订并颁布了《出版法》，用法律条文和暴力手段来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同时他又用金钱收买舆论，创办御用报纸。在他独裁统治时期内，御用报纸和黄色小报得以大肆泛滥，而进步报刊则遭到野蛮摧残。据调查统计，全国报纸至少有 71 家被查封，49 家受传讯，9 家被军警捣毁，新闻记者至少有 24 人被杀，60 人被捕入狱。袁世凯统治时期成为报业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辛亥革命后的报纸，在民国之初虽然繁荣了一时，但其精神实质却远不及清末。究其原因，还是由于思想认识的局限。待到袁世凯卷起的那股逆流弥漫乃至主宰了中国，曾使资产阶级革命派陶醉的革命成果被吞噬殆尽的时候，严峻的现实才促使人们认真思索。革命家们也曾重新进行“二次革命”，但是武装斗争迭遭失败，文化思想战线的斗争也显得缺乏声势和力量，报业出现的低潮就是这种现实的反映。北洋军阀中的皖系、直系、奉系相继执政后，政局更加动荡多变，报业的命运也愈发复杂艰辛。前途似乎一片渺茫。

但是历史不会期待太久，当“五四运动”如狂风暴雨般到来的时候，历史将翻开新的一页。中国的报业也将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为标志，为近代报业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

#### 四

报刊的作用是通过报刊文来实现的，中国近代报刊的性质与特点决定着近代报刊文的内容与形式。由于我国近代报刊是启蒙运动的产物，担负着传播启蒙思想、唤醒民众、为政治运动制造舆论的任务，因此政论文成为最重要的一种报刊文章样式，并以其鲜明的启蒙思想倾向，出色的说理论辩能力，发挥着很好的宣传教育作用，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报刊政论文是中国启蒙先驱者们的沉思与呐喊，它激昂悲壮而又深沉，充满对历史的思考、对现实的焦虑以及对未来的希冀与渴望。在中国封建王朝彻底崩溃的前夜，在那个前进与倒退、光明与黑暗、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时代，这些启蒙先驱者们呼喊出民族救亡、爱国图强的时代最强音，将中国人民从备受屈辱、民族危亡的境地中唤醒，从而开始了一场持久而悲壮的救亡运动。这种积极的思想意义，即使在今天仍然给予我们许多深刻的启迪与思索，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

《循环日报》是国人创办的最早报刊之一，它的创办人王韬在报上发表的《变法》、《尚简》等政论文，提倡学习西方，宣传政治改革，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维新运动的先声。戊戌维新运动期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有关变法维新的思想主张借助报刊上发表的大量政论文得到广泛传播。其中《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变法通议》、《论中国之将强》等重要政论，有力地推动了初期的启蒙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热潮的形成。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辛